

心芥蒼蒼齋藏

清代學子者法書選集

(續)

啓力題籤



小菴蒼蒼齋藏

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續）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续/陈烈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9
ISBN 7-5010-1141-9

I.小… II.陈… III.汉字-法书-中国-清代-选集 IV
.J2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618 号

小莽苍苍斋藏	編者	陳烈
清代學者法書選集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續)	發行者	北京五四街二十九號
	印刷者	http://www.wenwu.com
	經銷者	E-mail: web@wenwu.com
		河北新華印刷二廠
		新華書店
		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889×1194 大 16 開 印張:22
ISBN 7-5010-1141-9 / J·465

小
莽
蒼
蒼
齋

薄
一
波
題



舊時明月舊時橋
眉宇軒昂意自豪
欲向象臺臺上
問訊九州生
多事是今朝

丁卯春重到杭州
倘佯湖上有懷
宗英作
此小詩最奉
董志正之
辛未四月
胡繩



胡繩題詩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

禍福能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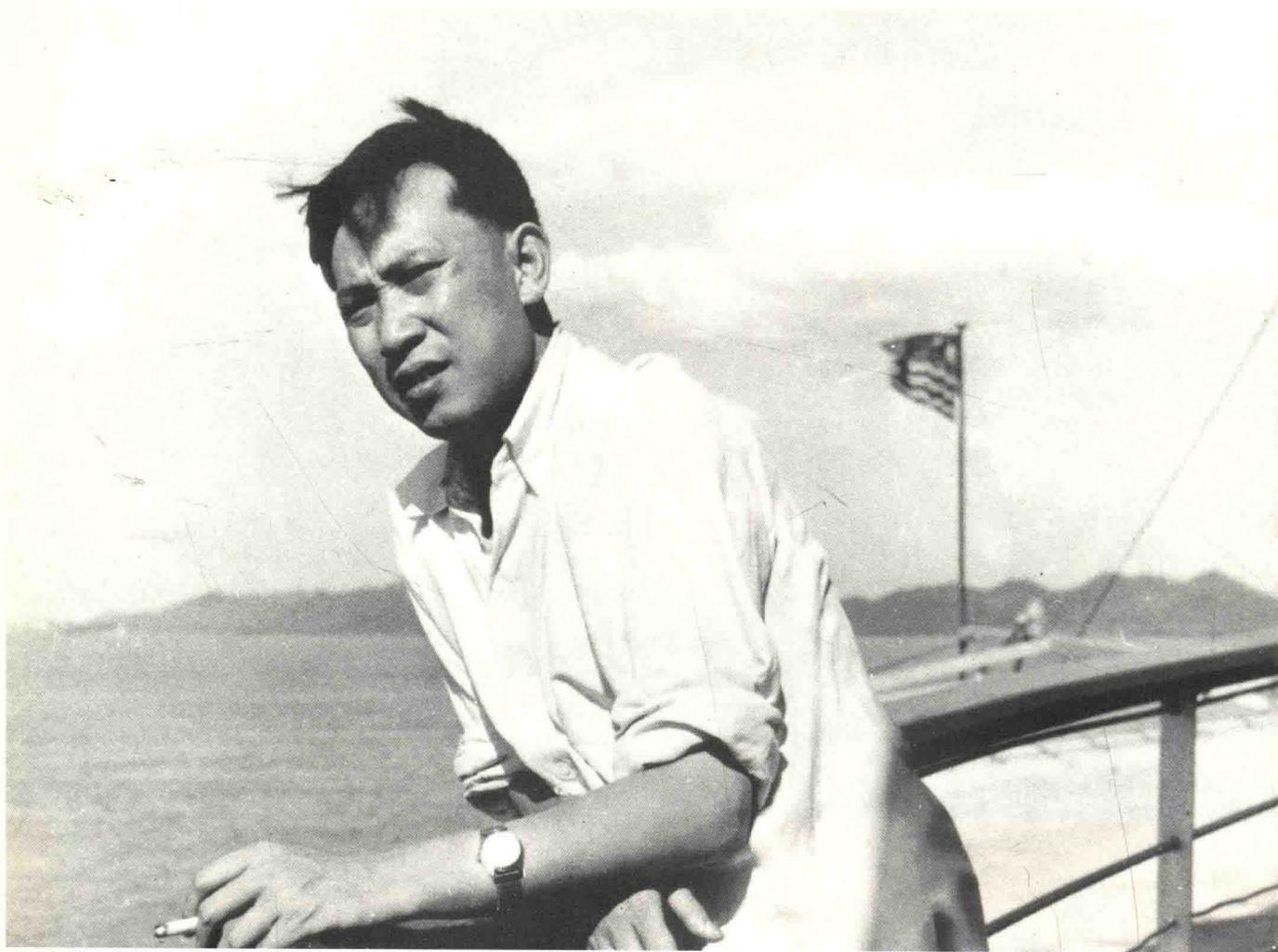
井少線白

董邊月書

沙孟海



沙孟海題詞



田家英參加廬山會議後在九江——南京的客輪上

吳冷西攝于 1959 年



楊尚昆和董邊同志在觀看《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

序言

戴逸

田家英同志逝世已經三十多年。在他生前，我無緣深交，但早聞其名，曾見其人，心儀已久。五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修改、出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一書，得到胡喬木、田家英等同志的鼓勵和幫助。我當時是個青年教員，協助胡華同志核對資料，校勘文稿。胡華同志多次從田家英同志處聽取修改的意見，借到一些歷史資料。他都把這些意見說給我聽，把借來的資料給我閱讀、選錄、摘抄。有一次開會，我遠遠地見到了田家英，當時他是毛澤東主席的秘書，看樣子年齡不過三十歲，溫文儒雅，風度倜儻，而說話出口成章，卓犖不群，這是我對他的初次印像。那次是茶話會，發言的人很多，田家英說了些什麼，我已記不清楚了。以後，曾多次讀過他以鄭昌筆名發表的文章，又曾在幾次理論和時事學習會上聽過他講課、做報告。他手中不拿講稿，却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講說。他對毛主席的著作十分熟悉，剖析深刻，從多方面加以闡發，立論極其精闢，對材料、例證則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所有這些，在我頭腦中

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六三年歷史學界的小型座談會上，與會的有範文瀾、翦伯贊、尹達、黎澍、劉大年等著名學者，地點在前門烤鴨店。當時這類座談會很少舉行，我的印象中田家英同志從未參加過這類座談會，這一次也許是破例參加罷。會上他興致勃勃地作了長篇即席發言，談的全是清代的學術文化和人物。我一向認為家英同志是卓越的馬列主義理論家、政治家，想不到他對清代的歷史和人物竟如此嫻熟，如數家珍。他談的是學術和現實的關係，歷述了清代後期邊塞史地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涉及祁韻士、徐松、李兆洛、何秋濤、李文田、洪鈞、楊守敬等人，以及他們的著作和貢獻。這些學者雖有較高的知名度，但除了專攻清史和歷史地理學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能夠縷述他們的生平、著作和成就。特別是在發言中還提到了一位不很知名的蕭穆。家英同志說：『蕭穆在江南製造局裏工作了很長時間。江南製造局是中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兵工廠。但當時的知識分子以機器製造為末務，不屑一顧，不關心不研究這些新事物。蕭穆雖長期在江南製造局工作，寫過一部《敬孚類稿》，但這部文稿中却没有一句話提到江南製造局和機器工業的。』田家英的這番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雖知道蕭穆其人，也知道有一部《敬孚類稿》，却没有看過這部書，也不知道蕭穆在江南製造局工作過。回家以後，趕快借來了《敬孚類稿》，果然，其中都是談經說古，考證贈序之作，并無江南製造局的一點痕迹。家英同志涉獵寬廣、淵博多識，實在難能可貴。可惜當時沒有錄音設備，我又未做筆記，田家英同志這篇極富學術性的發言，我祇記得一些片段內容，大多已記不清楚了。

我一直不知道田家英同志收藏了大批清人書法，知道這一消息已在八十年代之初，此時家英同志已逝世多年。有一天，家英同志之婿陳烈來訪，我和他以前并不認識，他知道我研究清代歷

史，向我詢問清代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他告訴我：家英同志在延安時，曾讀過梁啟超作序、蕭一山著的《清代通史》，很感興趣，同時也佩服作者的治學精神和勇氣。他認為，清朝是個很有代表性的朝代，可以說是集封建社會之大成，研究清代歷史，可以瞭解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但蕭的《清代通史》因受時代的局限，存在很多缺點，因此萌發了在有生之年撰寫一部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新的《清史》的願望。但這在當時，各種條件都不具備。建國初期，清人字畫書籍在古舊書店和地攤上隨處可見，因年代較近，很少有人把它當作文物來收藏。然而其中不乏對史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的資料。家英同志發現，許多出自清代文人、學者和官吏之手的作品，不僅書法藝術水平很高，而且內容豐富，是一批非常寶貴的史料。特別是一些書簡、手稿，對史學研究很有用處。于是就開始了他對清代學者墨迹的訪求和收藏，作為以後撰寫新的《清史》的準備。十幾年間，幾乎把他全部業餘時間和大部分工資、稿費都用在這件事上了。不論是手稿、冊頁、條幅、扇面、書簡、詩稿、題字、書籍乃至農民賣田的契約等，無不羅致，共得數千件。從時間跨度看，自明代末期至民國初，約三百年。正當他滿懷信心地為實現他撰寫《清史》而做必要的準備時，他怎麼也沒有料到，這個畢生的夙願連同他自己，都被一九六六年那場『史無前例』的颱風給毀滅了。這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帶着終生的遺恨，離開了人間。

通過與陳烈的幾次交談，纔簡略地知道田家英同志生前的志趣愛好以及在收集清儒墨迹過程中的劬勞與苦心。這樣，使我聯想起一九六三年他的那一席學術講話，其知識之廣博、觀點之精審、見解之深刻，實非一般學人所能望其項背。可惜家英同志沒有能夠實現他的宏偉抱負，我國清史學界沒有能夠得到這樣一位博學多才的研究者和導師。

當我初次見到小莽蒼蒼齋清人藏墨時，不免有點擔心：這麼多珍貴而凌亂的藏品，如何保存？如何整理？如何能如家英同志的願望那樣，用之于對清代歷史文化的研究？但當去年我看到了《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一書的出版，我心中的一塊石頭完全落了地。在田家英同志家屬的精心保護和努力工作下，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們的大力參與、協助下，小莽蒼蒼齋藏墨，不僅保存完好，有條不紊，而且印行出版，寫出了高水平的說明和釋文，可以供研究清代歷史和愛好書法藝術的人閱讀和欣賞。我由衷地感謝參加工作的同志們，他們繼承了田家英同志的遺願，很好地保護了這筆舉世矚目的文化財富，并公之于世。這將對我國的歷史研究和文化藝術建設提供了重要而有益的借鑒。

※ ※ ※ ※ ※ ※

科舉制度以文取士，為程式所限的八股文千篇一律，僅憑文章難以衡量其高下優劣，所以考官極重視卷面的整潔和書法的工拙。這種情況在明清兩代都十分普遍，至清代中期尤為嚴格。故而人們說：明清時實際上是以書取士。考卷上講究墨汁烏黑，卷面光潔，字體方正，即所謂『烏、光、方』。結果形成了刻板、劃一、僵化的『館閣體』。另一方面，明清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了應試，對書法都要勤學苦練，寒暑不輟，這也造就了一大批書法家。已出版的一冊《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中，即有十四位狀元的十八件書法作品入選。他們是順治時的徐元文，康熙時的彭定求，乾隆時的劉綸、莊有恭、畢沅、王杰、金榜、茹棻、石韞玉，嘉慶時的姚文田、吳其浚，道光時的龍啓瑞、陸增祥，咸豐時的翁同龢。由此可見科舉中人均精于書法，即所謂『能文章未有不嫻翰墨者』。

有清一代，實爲我國書法史上的繁榮期。真可謂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千枝競秀，百花爭艷，書法藝術豐富多彩。大體上，乾隆以前，帖派獨盛，書法家遠溯二王（羲之、獻之），追摹唐賢（如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虞世南等），歸于趙董（趙孟頫、董其昌），繼承傳統，發揚光大，各具風格。嘉道以後，碑派復興，書法家搜求臨摹鼎彝碑版，開闢創新，另成蹊徑，篆隸真草，諸體大備，達到了書法史上的高峰。

所謂『南帖』『北碑』，其分野始于晉室東遷。江左士族，雅擅風流，羲之、獻之爲書派南遷之祖。唯南朝不尚碑刻，文字均寫于縑帛，謂之『帖』。南派疏放妍妙，長于書牘，而篆隸古字，多所變更。北派則推崇索靖、崔悅，刻碑勒銘之風氣盛行，字體古質遒勁，長于碑榜，字體猶存古法。故南帖、北碑之分，實由于時代、地區之不同、書寫載體之不同、書法體裁、風格之不同所致。唐太宗喜好王羲之書法，南帖遂掩北碑而上。但唐代書法家尚多識古碑者，能兼習南北書體，故卓然多書界之宗師。自宋刻淳化閣帖出，帖學更廣泛流傳，而漢魏碑碣，多掩埋于荒草黃沙之中，逐漸磨蝕。故宋、元、明書法家獨尊南帖，其所見碑銘亦不多。清代前期承歷史遺緒，唯尊南帖。董其昌書體疏淡秀逸，爲帖學的集大成者。特別是由于康熙帝酷愛董其昌的書法，『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他刻的《戲鴻堂法帖》風靡海內。至乾隆帝，又愛好趙孟頫書，一時圓潤清麗的趙體字又大行於世。乾隆帝刊勒《三希堂法帖》，收集魏晉至明末的書法家一百三十五人，分爲三十二冊，其中趙帖佔五冊，董帖佔四冊，兩人的書法即占了全部篇幅的百分之二十八，可見清前期崇尚趙、董的時代風尚。晚清北碑派則又痛加抨擊，力詆帖學。如鄭孝胥稱要『以蕭散宏遠滌趙董之側媚。』又說『國朝競學董，暗然如鄉願。』（《海藏書法抉微》）康有爲則稱元明

書法多出趙孟頫之門庭，『姿媚多而剛健少』。又稱董其昌『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廣藝舟雙楫》）碑學派所說固然也抓住了帖學派的某些弱點，但門戶之見太深。貶斥異己，一筆抹煞，未必公正。平心而論，北碑派未必都是好字，南帖派也未必都是劣書，北碑南帖各有特色。阮元的《北碑南帖論》中曾說：『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環境和風氣對藝術的體裁和風格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很難以不同體裁和風格簡單地論定藝術之優劣高下。康有為說過另一段話：『人未有不為風氣所限者。制度、文章、學術，皆有時焉以為之大界。美惡工拙，祇可于本界較之。』這段話說得還比較公正。北碑南帖是不同時代的產物，代表不同的藝術風格，雄渾質厚和俊逸妍秀的藝術品可以并存，體裁和風格的多樣化正是清代書法藝術繁榮的表現，而不是信崇漢魏，就一定要貶低元明，推尊北碑就必須把南帖說得一無是處。

由明入清，最著名的書法家是王鐸、傅山和朱彝尊。王鐸是南明弘光朝的大學士，以迎降清兵為士林不齒，然書法極佳，與董其昌齊名。當時著名學者黃道周曾對他揄揚備至，稱：『行草近推王覺斯（王鐸字）……骨力嶙峋，筋肉輔茂，俯仰操縱，俱不由人。抹蔡（襄）掩蘇（軾），望王（羲之）逾羊（欣）。』（《石齋書論》）評價極高。但因屈節事清，書名掩而不彰。與王鐸齊名的書法家傅山則恰好相反，他極重氣節，清廷徵召不就，以黃冠終老。他在詩裏說：『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禮，筆墨不可補。』故傅山論字，推崇顏真卿而鄙視趙孟頫，因顏立朝正直，抗叛死節，趙則以宋之宗室而出仕於元。謂趙字『熟媚綽約，自是賤態。』（《霜紅龕書論》）當時人極稱贊傅山的書法：『行草書皆登宋人之堂，隸則中郎（蔡邕）以後，罕見其匹。』

（陳玠：《書法偶集》）稍後于王鐸、傅山的另一位大書法家朱彝尊，是一個博學多才的學者，既精經學，又擅詩詞古文。其所著《經義考》為世所重；詩詞則與王士禛、陳維崧齊名；文章則與魏禧、汪琬相伯仲。朱彝尊為清代講習漢隸之始。他把漢隸分為『方正』、『流麗』、『奇古』三種風格，以後的鄭燮、翁方綱、桂馥、伊秉綬則大暢其流。

清代前期，書法家人才鼎盛，尤侗、徐枋、王頊齡、王鴻緒、陳奕禧、查嗣琛、林佶、何焯、王澐、金農、張照、鄭燮、劉墉、梁同書、姚鼐、梁巘、錢坫、永理、鐵保等書家競呈才華，各擅勝場。讀者可以在這兩冊小莽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中查找到他們各自的作品。這些書家除王澐、鄭燮、金農有所變異外，均可歸入南帖一派。他們在王羲之、王獻之以及歐陽詢、顏真卿、蘇軾、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傳統，在書法史上留下了眾多的光輝傑作。其中最著名的，十八世紀前期當推王鴻緒、王澐、張照、鄭燮，十八世紀後期則有劉墉、姚鼐、翁方綱、永理等。

王鴻緒、張照都是江蘇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和董其昌是同鄉，雖年代不相及，然王氏兄弟（王頊齡、王鴻緒、王九齡）為董的嫡派傳人，張照又是王氏之外甥。康熙帝酷愛董其昌書，愛屋及烏，寵及王氏兄弟，南巡時曾兩次來到華亭王氏之秀甲園。王鴻緒之書法人稱『腴潤有致』。其甥張照推崇董、王的書法，謂『思翁（董其昌號思白）筆法真造化在手，有明一代推為獨座，雖松雪（趙孟頫號松雪道人）亦莫能與京。學思翁者多，唯儼齋（王鴻緒號）司農得其骨。』（《瓶齋書論》）張照從舅氏得董派書法，而參以趙孟頫，書藝精絕，雍乾之間，獨步一時。乾隆帝極其推重他的作品。御製《懷舊詩》中稱張『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繁，而無董之

弱。羲之後一人，捨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迹，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可學。』詩的注中又說：張照『尤工書，臨摹各臻其妙，字無大小，皆有精神貫注，閱時雖久，每展對筆墨如新。余嘗謂張照書過于董其昌，非虛譽也。』

《清史稿》中對王澐的評價是：『績學工文，尤以書名』，『摹古名拓殆遍，四體並工，于唐賢歐褚兩家，致力尤深。』他考訂法帖，用功很深，作《論書剩語》、《翰墨指南》揭示書法要領、書家宗派。他對趙、董籠罩下的書法界頗感不滿，說：『書道關於世運，自思白興，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他的眼光從傳統的法帖開始轉移到陸續發現的古碑碣，欣賞其字體的雄渾道勁。他曾說：『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實開後世北碑派的先河。但王澐本人未能開宗創新，他和何焯被視為明代書法家文徵明的傳人。

十八世紀前期，在董其昌書派鼎盛的氛圍中能够突破藩籬、別創新風的應推『揚州八怪』中的金農和鄭燮兩人。金農書法得力于《國山》及《天發神讖碑》而自成一格，自創『漆書』，融隸楷爲一體，具有警世駭俗的怪異風格。鄭燮字體以分書入行楷，創『六分半書』，在用筆、結體、布局上卓犖不群，筆法多樣而具法度，結構獨特，寬窄聚散正斜，錯落有致，奇趣橫生。他把作畫的方法運用來寫字。故蔣士銓的詩中說：『板橋（鄭燮之號）作字如畫蘭，波磔奇古形翩翩。』金農、鄭燮新穎而怪異的書法，別開生面，引起後人的許多議論。如楊守敬說：『板橋行楷，冬心（金農號冬心先生）分隸，皆不受前人束縛，自闢蹊徑。然以爲後學師範，或墮魔道。』

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初的書壇，衆推劉墉、翁方綱、成親王永瑒、鐵保爲清代中葉之四大書法家。劉墉書體雄厚蒼勁，味厚神足。『論者譬之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爲一代

書家之冠。』他的書法融會諸家而多變：『少年時爲趙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臺閣，則絢爛歸于平淡，而臻爐火純青之境矣。世人每譏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之妙處，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也。』（易宗夔：《新世說》）康有爲說：『集帖學之大成者劉石庵也。』（《廣藝舟雙楫》）翁方綱初學顏真卿，後學歐陽詢，隸法《史晨》、《韓敕》諸碑，『雙鈎摹勒舊帖數十本，北方求書碑版者畢歸之。』（《湖海詩傳》）其隸書、小楷尤爲精工。但翁講書法離不開考據，一點一畫，窮究來歷。包世臣譏誚他：『宛平（翁爲宛平人）書祇是工匠之精細耳！』（《藝舟雙楫》）楊守敬也批評他『天分稍遜，質厚有餘而超逸之妙不足。』據說翁方綱的女婿戈某正好是劉墉的學生，戈某問翁：『劉墉的書法造詣如何？』翁說：『去問你的老師，他哪一筆合乎古人法度？』戈某果然去問劉墉，劉墉對戈說：『我寫的是自己的字，不論古人法度。去問你的丈人，他哪一筆是自己的字？』可見劉與翁的書法風格迥然不同：劉主創新而翁重守成。永理、鐵保小於劉墉三十多歲，小於翁方綱二十歲，然四人齊名。永理是乾隆帝的第十一子，封成親王。永理亦學歐陽詢、趙孟頫，其手迹刻爲《詒晉齋帖》。據說他『幼時握筆，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趙文敏（孟頫謚號文敏）。又曾見康熙中某內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其昌謚亦文敏）握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故王推廣其語，作「撥燈法」，談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昭槤：《嘯亭雜錄》）鐵保楷書摹顏體，草書學王羲之，旁及懷素、孫過庭。劉、翁、成、鐵四家，後世亦有訾議。如晚清書學理論家張之屏的《書法真詮》中，對清代帖學派一概抹煞。他有這樣一段話：『友人周祇述曰：「有清一代，大名鼎鼎者，子都置之不齒。若嘉慶時之翁、鐵、成、劉則何如？」曰：』